

## 【研究ノ一ト】

## 論中国的經濟体制改革

梁 繼 宗\*

中国於1964年提出農業、工業、国防和科学技術現代化目標。這個目標展示了社会主义經濟發展的遠大前景，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強烈願望。中国共產党自1978年12月舉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總結歷史經驗，根據国土遼闊、人口衆多、自然資源豐富、已建立獨立的、比較完備的工業体系和国民經濟体系、但經濟底子薄、科学技術落後、各部門各地区發展不平衡、舊的經濟体制阻碍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情況，確定了建設中国式現代化的指導思想以及對内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總方針，作出有步驟、分階段實現現代化的部署，大致說，到本世紀末，工農業年總產值增至1980年的4倍，即：按1980年價格計算，由7,077億元增至28,308億元，算GNP相當於10,000億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則達到小康水平，即人均GNP 800美元，糧食500公斤，此時中国將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在此基礎上，中国人民繼續奮鬥50年，即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100周年時，使国家在經濟上和科学技術上達到發達国家的水平。就是說，中国決心從1980年起經過70年努力實現現代化目標。這是一個宏偉的戰略計劃。

舊的經濟体制主要運用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經濟，忽視甚至排斥商品生產，實行平均主義的分配。它压抑企業和勞働者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強固各經濟部門和地区的封閉性，阻碍先進技術的吸收、應用和推廣，是造成以往經濟發展較慢、不穩定性較大的重要原因。有步驟地進行改革，建立充滿生機活力的經濟体制，是發揮社会主义制度優越性和經濟潛力、保證經濟長時期地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根本條件，也是中国式現代化和對内搞活經濟的宗旨所在。這里在理論和實踐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正確處理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和交換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

\* 1985年9月より1986年4月まで同志社大学經濟学部客員研究員として研究。

要因素，在社會主義階段，不單是全民所有制經濟與集體所有制經濟之間的經濟關係，也是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作為經濟細胞與實體的企業之間的經濟關係，商品、貨幣、價格、市場及其反饋機制因此成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內在因素，起着發展社會分工、推動技術進步、完善經營管理、開發經濟資源、擴大勞動就業、縮小地區間和城鄉間差距、提高經濟效益、滿足社會需要、改善人民生活等多方面功能。固然，商品經濟也會導致生產經營的某種盲目性，一些單位或個人會利用商品貨幣關係來謀取私利。但關鍵在於基本制度和政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以公有制為基礎，勞動力、土地、鉅藏、鐵路、銀行和國有企業都不是商品，堵塞了剝削階級產生的途徑，公有制以及與之相聯系的計劃機制使國家具備宏觀調節的功能和手段，企業的生產和經營也因之增強其計劃性和組織性，總的效應是發揮商品經濟的積極功能，而將其消極的副作用約束在較小範圍和較低程度。中國的商品經濟本來不發達，“左”的理論和政策又將之等同資本主義經濟，加以人為的限制，結果給國家和人民增添了許多困難，加重了經濟的落後性。在公有制基礎上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搞活國民經濟、實現經濟增長目標、發展生產力、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必經階段。

農業是國民經濟基礎，農村人口佔總人口的80%。他們的狀況如何，關係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極大。以往人民公社體制不但有舊體制的一切弊端，而且把3億多農業勞動力束縛在有限的耕地上，從事以種植糧食為主的單一經濟，造成農業勞動生產率很低、農民生活改善不大、拖國民經濟後腿的局面。經濟體制改革因此發端於農村。1979年後，國家支持和引導農民普遍推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要經營方式的生產責任制（又稱大包乾責任制），由家庭作為生產經營單位，承包屬於國家或集體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在國家和集體計劃指導下，按照自然條件和社會需要，自主進行生產經營，實行自負盈虧，在交够國家的農業稅、按照承包合同留足集體的公積金和公益金之後，所餘全部歸己。這是充分發揮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的多種經濟職能，把承包責任、生產經營自主權和按勞分配的經濟利益三者結合起來，把國家、集體和勞動者三方面利益結合起來的社會主義合作經濟體制，是中國農民的一大創造。以此為基礎，實行決不放鬆糧食生產、積極發展多種經

營的方針政策，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利用剩餘勞動力和剩餘勞動時間，因地制宜地發揮自然資源富饒，活動場所廣闊的優勢，通過由合作或個體經營的鄉鎮企業、專業戶以及多種形式的經濟聯營體，積極發展林業、牧業、漁業、副業以及包括采鋤、建築、交通、小型發電、建築材料和農副產品加工、商業和服務在內的多種經營，在經濟發達地區，還發展為大工業配套和為出口貿易服務的現代工業，與此同時，組織城市生產力向農村擴散，鼓勵農民進城興辦第三產業，以促進城鄉的經濟聯合，把自給半自給的舊式農業轉移到農工商綜合經營、按市場需要生產的商品生產軌道。

中国在堅持全民所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前提下，實行發展多種經濟形式的政策，其中主要是鼓勵和扶植集體經濟即鄉鎮企業和城市集體企業，允許個體經濟有較多的發展，使他們成為全民所有制經濟的得力助手和必要補充。這是一項長期政策。中国人口衆多，勞動力資源豐富，據預測，到2000年給人口數可能達到12.53億，勞動力人口（指男16-59歲，女16-54歲）將一直上升，其中農村勞動力將增到4.5億<sup>1)</sup>，城鎮勞動力每年新增數百萬（1986-1990年每年達600萬），因體制改革和技術革新而富餘的全民企業職工將達1千多萬<sup>2)</sup>。而到2017年，勞動年齡人口將達8.3億<sup>3)</sup>。在耕地資源有限、全民企業不可能吸收全部新增勞動力的條件下，不發展多種經濟形式，這龐大數量的勞動力就沒有出路。何況，城鄉集體和個體經濟星羅棋布，機動靈活，加上發展過程中必然包含的技術進步，他們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之大，難以估量。

在農村體制改革成功的基礎上，進行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這裏的關鍵是正確地確定一個關係全局，能夠帶動全面改革的環節。這只能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的體制改革。

企業是國民經濟的細胞組織和經營實體。經過三十多年建設，中国有了1百多萬個工業、建築業、交通運輸、商業和服業企業，職工8千多萬，單是城市工

1) 《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年2月25日 第四版。

2) 趙守一《加快勞動、工資、人事制度的改革》，《中國勞動》1985年 第1期。

3) 同1)。

業企業的稅和利即占國家財政總收入 80 % 以上，其中屬全民的大中型工業企業 5,800 多個，雖只占企業總數的 2 %，但固定資產占總數的 66 %，工業產值占 47 %，上繳稅利占 66 %（1984 年資料<sup>4)</sup>），他們是生產力發展和經濟技術進步的主導力量，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承擔者，在國民經濟中居舉足輕重的地位。

舊體制下的企業只是有關行政部門的附屬物，無自主權，單純生產，不負盈虧，吃大鍋飯。1980 年開始試點、1984 年作出決定的改革，以企業體制改革為中心，其實質是按照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要求正確處理國家與企業、企業與其職工的關係。就國家與企業的關係說，劃清國家對企業的所有權同企業的經營管理權，前者體現在國家通過計畫並運用經濟的、法律的和必要行政手段，控制和調節企業活動，以稅收等方式征收企業純收入中應由國家統一支配的部分；企業在執行國家計畫，服從國家控制的前提下，擁有在產、供、銷、人、財、物等方面的自主權，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成為具有一定權利、承擔必要責任的法人。就企業與其職工的關係說，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規定廠長受國家委託，統一領導和全權負責本企業的生產指揮和經營管理工作，同時加強民主管理，保證職工在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廠長要依靠企業的黨組織和職工羣衆，接受他們的監督。理順這兩方面的關係，促使企業致力於內部改革和技術革新，增強在國內外市場的適應和競爭能力，成為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活力，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生產經營開拓型企業。企業活力是社會主義經濟全面發展的基礎，從而是完善全民所有制的中心環節。圍繞這個環節，對下列體制和制度進行改革：

計畫體制 對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品產和牽動全局的經濟活動實行指令性計畫，對其餘產品實行指導性計畫，而某些農產品及全部副業產品、小商品和一般服務業，則由市場供求關係調節。企業在完成指令性計畫任務後，可依據指導性計畫，發掘內部潛力和通過外部協作，增產市場需要的產品，自行售銷。總的方向是，逐步縮小指令性計畫和擴大指導性計畫的範圍，國家主要用經濟和法律手段，並採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來控制和調節經濟運行。

4) 呂東：《堅持改革，開拓前進，把企業搞活》，《新華月報》1985 年 第 2 期。

價格體制 舊體格的主要問題在於：許多商品的價格既不反映其價值，也不反映供求關係；不按質論價；若干鈹產品、原材料和半成品價格偏低；由國家經營的農副產品零售價低於收購價，差額由財政補貼，價格管理過於集中。現行改革是，消費資料，除極少數重要商品仍由國家定價外，一般商品要根據市場供求狀況逐步放開；重要生產資料，要逐步減少國家統一定價部分，擴大市場調節部分，同時分步驟地調整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的差距；重要的公用事業和勞務的收費標準或價格仍由國家管理，其他屬第三產業的價格逐步放開。由此形成的價格體系將由計劃價格（少數商品和勞務）、浮動價格（在國家規定的限界內）、自由價格組成，既有統一性，又有靈活性，體現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性質。價格體制改革以農產品價格改革為先導。國家對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這項政策在保障城鄉供給方面起過重要作用，但多年來在價格上既有偏低和比價不合理的問題，又有銷價低於購價、財政補貼劇增的問題，急待解決。近幾年農業豐收，農村產業結構需要調整，因此有必要與可能逐步停止統購統銷，放開農產品價格，擴大市場調節，引導農民按照市場需要和自然條件來安排生產。為了保障農民利益和城鎮人口需要，國家對糧棉產品的大部分按優待價收購，其餘部分實行自由浮動的市場價格，如市價低於統購價，國家仍按後者收購。至於蔬菜肉類水產禽蛋等則全部開放，隨行就市。農產品價格改革，一方面調動農民增產的積極性，同時又穩定國計民生，有利於全面改革價格體制。

工資制度 按照企業特點，建立不同層次和形式的經濟責任制，使企業、車間（科室）、班組直至個人，按其實際貢獻的大小，享得應有的物質利益，同時有步驟地推廣企業的工資總額同他的經濟效益掛鈎的制度。這裡有一重要原理和政策規定，就是承認和保障一部分人和企業依靠勞動先富起來，而後帶動並實現共同富裕。那種認為所有社會成員應同時和同等程度富裕的看法和做法，是否定按勞分配的絕對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其後果只能是共同貧窮。當然，仍要正確處理國家、企業、個人三方面的利益關係以及生產和消費的關係，在着重克服平均主義的弊端時，也要防止收入懸殊，實行必要的社會保障和救濟，從物質和技術等方面幫助後進、落後單位、地區和困難戶改進經營，增加收入。

與此同時，在流通體制、財政稅收體制和金融體制等方面進行相應改革。

對外實行開放是1979年後確立的基本國策。開放是商品經濟的特性。實行開放是一個國家有力量的表現。中國自西漢開通絲綢之路之後，基本上是開放的。大概到了明朝中葉到清道光年間，三百多年閉關自守，中國從此落後。1840年鴉片戰爭後的門戶開放，是資本主義國家宰割中國的侵略政策。新中國成立後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是開放的，但只對蘇聯和東歐國家開放，以後就關起門了，嚴重地阻礙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這是歷史教訓。在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生產愈益國際化的今天，任何國家不可能閉關自守、自我孤立。再從中國國情和發展目標看，唯有根據獨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則實行對外開放，建立和發展同世界各國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貿易往來和技術交流關係，才能開發和利用國外資源，為社會主義企業開拓國外市場而增強其競爭能力，並鍛鍊和造就建設人才，加速現代化進程。

對外開放首先是為了利用外資和引進先進技術。利用外資方面，按照平等互利原則，通過多種形式並給與必要的法律保障，吸引國外資金，歡迎國外廠商在開放地區和城市舉辦合資企業，合作企業和獨資企業，特別是技術密集型和出口創匯型企業，為此開辟了利用外資的廣大的、多層次的地區：1979年設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1984年開放沿海從大連到北海的14城市和海南島；1985年設珠江，長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區3個沿海經濟開放區；在內地沿江，沿鐵路公路和航空路線處還開放一大批城市。引進外資是同引進先進技術結合的，但後者還包括引進國外智力的內容，主要是引進人才和科技成果，建立同國外工程技術人員在產品開發、技術設計和工程施工方面的合作關係。

對外開放歸根結底是為了增強自力更生的能力，而利用外匯和引進技術的規模最終要由國家的創匯能力決定，因此，進口貿易必須保護民族工業，同時盡可能地發展出口貿易、勞務出口和技術出口，發展國際交通運輸，發揮旅遊業優勢，增加貿易和非貿易的外匯收入。根據貿易雙方在互為對方開拓市場方面有共同利益的原則，中國要求有關國家和地區增加從中國的進口。

開放政策包括對內開放。舊體制單純強調企業對主管部門的縱向隸屬關係

(通稱條條)，各地区(通稱塊塊)在經濟上力求自我滿足，條條塊塊相互分割，自給自足。體制改革就是開放，破除封閉、僵化的舊體制，把企業從條條塊塊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按照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要求，發展以企業聯合為主體，包括各地区、各中心城市在生產流通和科學研究等領域的橫向經濟聯合，互通有無，取長補短，使已經取得但被分割的生產力組成綜合的新生產力並形成統一的社會主義國內市場。這對於企業、部門、地区以至全國的經濟增長將起極大的推動作用。

同經濟體制改革相配合，還進行科學技術工作體制和教育體制的改革，以發揮他們在現代化事業中的基礎和先導作用。

綜上可見，中國現階段所全面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導地位的基礎上，按照社會化大生產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要求，把計劃和市場、宏觀控制和微觀搞活結合起來，把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統一起來，堅持內外開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其總的方向就是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為現代化建設開拓康莊大道。

改革和開放政策將中國經濟推進生機最為旺盛的時期。工農業生產持續以較快的速度增長，特別是農業在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1981-85年)的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0%，按照目前食物結構和衣着水平，糧食已可自給，棉花自給有餘，禽蛋肉蔬市場全面開放；輕重工業比例趨於協調，輕工業產品的花色品種不斷增加；廣大城鄉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到1984年，農村已有99%以上的農戶實行大包乾責任制，城鎮集體所有制職工人數達3,216萬人(1978年為2,048萬人)，城鎮個體勞動者達339萬人(1978年為15萬人)，兩者占城鎮勞動者比重達29.1%<sup>5)</sup>。國營企業從封閉的單純生產型開始轉向開放的經營開拓型，素質顯著提高，1985年全國全民所有制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達15,300多元，比1984年提高9.4%<sup>6)</sup>；對外經濟合作的發展勢頭很好，到1985年9月底，已設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1,881家，中外合作經營企業3,408家，外商獨資企業104家，共5,393家<sup>7)</sup>。企業或區域間橫向經濟聯系發展迅速，前者朝着群體化和集團型的方向，形成一大批

5) 《人民日報·海外版》1985年9月18日 第一版。

6) 同上，1986年2月22日 第一版。

7) 同上，1986年1月14日 第一版。

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的新型企業經濟聯合體，後者朝着全國性的（東、中、西三地帶）、區域性的（如上海經濟區、東北經濟區、川滇黔桂渝四省一市以及西北五省區等）、城市群體間以及城鄉間的聯合和協作的方向發展，在“六五”計劃期間，全國簽訂的各種經濟協作項目達35,000項，物質協作總金額340億元<sup>8)</sup>。由於經濟實力增強，國家財政狀況好轉，1985年包括國家財政收入和地方、部門、企業擁有的預算外資金的總收入將超過3,000億元，比1980年增長近一倍<sup>9)</sup>。收支基本平衡；城鄉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六五”計劃期間新就業的城鎮勞力達3,000多萬人，全國職工工資總額增長5成，職工平均工資增加20%，農民平均純收入增加80%<sup>10)</sup>。增長幅度之大，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所少見，當然，現階段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還低，但本世紀內向小康水平發展的趨勢是確定無疑的。

在十億人口的国家進行革除數十年積弊的改革事業不可能毫無困難，一帆風順。近年來尤其是1984年第四季度和1985年第一季度的一段時期里，出現了經濟生活某些緊張和紊亂現象，主要是：工業生產增長速度過快，看重產值，忽視質量，消耗過大，企業經濟效益仍低；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基本建設戰線太長；信貸資金和消費基金增長過快；結存外匯下降，加以不正之風的作用，結果，在財政收支、物資、信貸和外匯收支四個方面的平衡關係受到影響，貨幣一時增發，導致物價上漲，部分商品價格上漲過多的問題。這些現象，一方面反映了經濟發展水平還低、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較落後、基礎設施不足、資金短缺、能源緊張、信息不靈等客觀條件，對於如何正確處理社會主義計劃機制和市場機制的關係還需要積累經驗，也表明舊體制和封閉性經濟的慣性力還很大。

為了認真對待困難和解決已出現的問題，中國除了採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外，為第七個五年計劃（1986-1990年）制訂以下基本指導原則；堅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設互相適應、互相促進；堅持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基本平衡，使積累和消費保持恰當的比例，使基本建設規模同國力相適應；堅持把提高經濟效益特別是提高質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正確處理好質量和數量、效益和速度的關

8) 《人民日報·海外版》同上，1986年3月13日第一版。

9), 10) 同上，1985年12月13日第一版。



係；堅持在推進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大力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並重申對外開放是基本國策。還決定1986年作為鞏固、消化和完善改革的時期，把經濟增長率控制在7—10%，就世界範圍看，雖然不是最高但依然是高速度，這對於穩定經濟、積蓄發展的後勁、順利開展改革、擴大對外經濟合作等方面，都有好處。

1979年後的經濟體制改革政策是正確的，開創了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局面，因此得到各族人民熱情擁護。但一些人仍有怕變的疑慮。這是沒有根據的。改革和開放的政策，是科學地總結三十餘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從國情出發，以各族人民利益為依歸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為目的的，實踐中已取得巨大成就。決定政策變不變，在於政策是否正確，政權是否穩固以及人心的向背，在這些關鍵點上中國處在建國以來最好的形勢之中。何況，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已經而且繼續採取得力的政策和組織措施，改革幹部體制，實行整個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切實改進幹部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以保證政策的連續性。中國現代化事業必將在體制改革的推動下穩步前進。

#### 【主要參考文獻】

- [1]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第12屆中央委員會第3次全會通過，1984年10月20日）。
- [2]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1985年9月23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